

古
籍
點
校
經
傳
彙
纂
錄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

四



中華書局

古籍点校疑误汇录

(四)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籍点校疑误汇录.4/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小组编.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2002重印)

ISBN 7-101-00813-5

I. 古… II. 国… III. 古籍整理—中国—文集
IV. G2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1405 号

责任编辑:沈锡麟

古籍点校疑误汇录

(四)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2½印张·250 千字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1-5000 册 定价:21 元

ISBN 7-101-00813-5/Z·88

序

近年来，有关古籍的整理，从标点上、校勘上、注释上说，都是很有成绩的。但部分的书，或书的某一部分，标点不当，校勘不确，注释不精的情况还是有的。譬如中华本《二十四史》，是以一个极整齐的专家组织来完成的，亦不是无懈可击，细细阅读，仍然会找出一些标点不当的地方。

标点，总的要求是适当的分段，恰当的应用逗号、句号、顿号、分号和冒号这些符号来断句。可惜古人著作，逻辑性不强，有时段落不清，因此分段时某些句应属上，应属下，也颇费斟酌。断句则有各自对文义的理解的程度，某字属上，某字属下，甚至有些文句，至今仍属争议，未能一致通过。除此之外，其所以不当，也有一时的疏忽之处。

校勘就有底本、校本、参校本的问题，异字、异文的裁断的问题，衍文、错简的认定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特别需要有汉文字学的知识，其不当之处，就不能推之于一时疏忽了。

至于注释，更首先要求是有关这一古籍的专门知识，

其次是相应的辅助知识。不懂先秦文字的使用，不懂墨家哲学，不懂一点科学，要注释《墨经》就比较困难了。这不是一般的目录学，一般的校勘学所能应付得了的，勉强搞出来的东西，自将疵漏百出了。

同时，还有编辑一道关。作家颇不满意于编辑先生的经常退稿，并附一复信，指出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其实，当编辑的工作是很苦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寄来的或约定的稿子，都得通读一遍。编辑只是一种职务，它并不表示比来稿的作者的知识水平就怎么高好多。即或通读了，有些点、校、注的错误，也会在编辑的眼皮下溜过。编辑不能负一切责任，但有些书的点校情况不佳，而又居然出版了，则显然是编辑把关不严之过。

因此我们经常在文、史、哲的期刊上，在各大专院校的学报上，看到有些文章，对于某些古籍，或某些古籍的某些部分，针对校点不当，校勘不确，注释不精的地方，详细提出意见。有关这些意见的文章，发表时间有早有迟，学术范围有文，有史，有哲，议论水平有的成系统，有的属随笔。且散在各期刊上，如需参考，实难随手查核。现在，我们尽可能就所见所闻，广事搜集，把它们录为一编，付之排印，以便翻检。

这些作者是不是有意向鸡蛋里挑骨头呢？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原书不误，鸡蛋里并无骨头可挑。二是原书确有误，居然在鸡蛋里挑出骨头来了。我们不想自居于法官地位，滥行裁决，我们亦不是任何一方的辩护律

师，辩称你错他对。我们现在虽然把这些有意见的文章搜印在一起了，我们却采取个“和稀泥”的办法，把这本书命名为《古籍点校疑误汇录》。这可能会成为一本对校勘学有辅助意义的书。图书馆或可供陈列参考；出版社或可根据已提出的意见，在印第二版时有所改正；文史哲各部门的研究者或可从中吸取一点经验教训。假如我们在这方面的古籍整理水平逐年都有所提高，使那些挑骨头的同志们，无所着笔，这类汇录就不必再印第二本了，实为万幸。

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大，治学态度稍事严肃，就会大大改观。乾嘉学风主要在创造发明方面，其末流乃流为烦琐，为世诟病。今天的问题，在于继承乾嘉学风当中，不是发扬主要的方面，而是模仿末流且又过之。

兹姑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为例。

王著《经传释词》十卷，共列词二百五十四字。本书全文概计为十万字，平均每词举例不超过四百字。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春秋史传，以及有关注家，都引用到了，文字却非常简洁。引注家时，有“王肃注”、“皇侃疏”、“颜师古注”等，而对郑玄的注，则只“郑注”两字，杜预的注，则只“杜注”两字。词字注音只有：“吹音聿”、“台音饴”、“号音豪”、“乡音向”、“汔音迄”、“邪以遮反”、“于音鸟”、“愁鱼覲反”、“其音记”、“其音姬”、“詎·巨遽二音”、“徂读为且”、“且子余反”、“曾音增”、“曾音层”、“晉音惨”、“嵫音兹”、“毗音紫”、“啻施智反”、“属音烛”。十六处音

读，四处反切，仅为全书列词的百分之八。而这类音读的标示，皆和释词有关，不是为音读而音读。全编整个结构极为朴素，到能说明问题解决问题为止，绝无枝蔓之嫌。举某一词作某解，引用一古籍文句之后，例将某解替换某词，以明文义。而后又复举古籍若干例，则不再分别以某解替换某词，仅结言“义同”、“义并同”、“其义一也”、“义亦相近”、“互文耳”、“皆仿此”，等。或则于引用古籍文句之后，接以“是也”二字，或直言以上皆某义，以证其说。又如引用典注与己意不合者，则多结言，“于义未安”、“故多不安”、“失之”、“解者皆失之”、“皆于文义未协”、“则失之矣”，或直言“非也”。这既合于“举一反三”之理，亦使读者自行思维，经过词义一一替换的过程，加深了解，自此，变王引之的释词为读者自己的释词。在这个基础上，读者将会在运用方面，有所发扬，扩大这一认识范围。近人张相为《诗词曲语词汇释》，依例举词，以释词曲，文从义顺，灿然成编，《经传释词》之作实为其先导。

对于《经传释词》，章太炎虽然写了一篇《王伯申新定助词辨》，以正王误，以申己说，但所列词不过十一例耳，尚不足王著列词的百分之五。但章在其《检论》上说：“(王)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词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给了王氏父子以极高的评价。所以这样能形成所谓“乾嘉

学风”，学者绝不依傍汉儒，而在熟读深思，独创新解。乾嘉学派的大师都是些有创见的人，其著作作风也是很朴素简洁的。这一派的后起者，乃以堆垛为事，烦琐为上，抄袭为能，流弊所及，自成为魏源、龚自珍直接攻击的对象。仍以《经传释词》为例。近人如拿到这个题目，即或还是二百几十词，但在写作上则非加上十倍，写够一百万字不可，似乎不如此不见功力。我偶翻《魏源集》（中华书局标点本），见其《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他引了班固《艺文志》一段话，现节要于下：“……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看来烦碎之祸，早在东汉就有了，以此亦不能完全怪在乾嘉学派身上。解释五个字就要二三万言，是每字的释文当为四千字到六千字。做部《经传释词》，以每词四千字为准，天公地道，自然就该一百万字了。

这些注家大概都把读者看成劣等中学生，不会查字典，普通到一二三四，都要引《说文解字》，以证明其一是一，二是二。这不过起了抄录的作用，即抄录亦无真知灼见的抉择；对于前人立意，未必了了，即有，亦依违其间，无所可否。对于此一学术领域，真正有何创见，有何发明，就更难说了。至于行文之啰嗦，动辄数十万言，既嫌词费，亦类炫博，其例甚夥，皆无当于学术著作之实际意义。

遵循唯物辩证法的逻辑，议论则独具匠心，务去陈言，述作则力求精炼，誓戒烦琐，十年二十年后，其影响所及，或能对中国古籍之整理与研究，养成一种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凡此所言，尤愿青年学者留意及之。

《汇录》辑成，因为之序。

一九八四年大暑 李一氓

出 版 说 明

1981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随后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任命李一氓同志为组长。经过半年的筹备,规划小组于1982年3月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工作会议,制定了《古籍整理九年(1981—1990)规划》,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呈现生机勃勃的气象,仅1982—1983年两年,即出版新书510多种,重版书350多种,两者合计860多种,闹了多年的“书荒”问题随之缓解。面对古籍整理成绩喜人的局面,李一氓同志及时提出质量问题,指出有些书标点不当、校勘不确、注释不精,并于1983年年底要求规划小组办公室尽可能就所见所闻,广事搜集,把在文史哲期刊上发表的批评性文章录为一编,付之排印。根据李老的指示,规划小组办公室自1983年至1990年,逐年将各种文史哲期刊和大专院校学报上发表的有关古籍整理(包括标点、校勘、注释、今译)的批评性文章,汇编成《古籍点校疑误汇录》(以下简称《汇录》),第一、二册作为内部资料印发,三、四、五册改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六、七、八册未曾付

印,但基本上业已编就。

《汇录》第一册于1984年出版时有一《说明》,主要内容是:收入《汇录》的文章,大致按综合、文学(诗文、小说、戏曲、文学评论),历史和工具书顺序编排;至于文章内容,除个别注释予以删节,个别错字径予改正外,概仍其旧,其批评正确与否,编者不作判断;文章中批评的一些点校本、注释本、今译本,容或存在所指出的问题,但批评者往往就个人的见解提出意见,并非系统的评论,因此并不表明被批评的书质量必定很差。今天看来,其态度和做法,还是相当公允和稳妥的。

对《汇录》的编印,李一氓同志十分重视,亲自为该书拟定书名,撰写序言,题写书签,并予以充分肯定:“这可能会成为一本对校勘学有辅助意义的书。图书馆或可供陈列参考;出版社或可根据已提出的意见,在印第二版时有所参酌改正;文史哲各部门的研究者或可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使古籍整理水平逐年有所提高。由于《汇录》不仅为查找资料提供方便,而且对研读古籍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许多古籍整理工作者视之为良师益友,一些大专院校还将它列为文科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不久前,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出于对古籍整理人才培训的需要,要求我们重印出版,我们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由于时间较紧,近日只推出前六册,后两册尚有一些编辑工作要做,估计年底才能出版。

这套书的重印出版,得到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领导小组的资助，在此谨致深切的谢意。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2年10月

目 录

- 校点注释零谈 柳曾符 (1)
略谈古籍的标点 刘叶秋 (5)
从《马氏文通·序》的两处误标说到
顿号在古籍整理中的使用 吕友仁 (16)
努力做好《章太炎全集》的校点工作
——读《章太炎全集》第二卷琐议 张文质 (24)
《唐宋词选注》指瑕 刘凯鸣 (79)
《全宋词》误收曹遇词 罗敏端 (89)
范仲淹没登过岳阳楼 刘洪坤 (91)
《辛弃疾词选读》献疑 段晓华 (92)
《后村词笺注》商榷 向以鲜 (96)
顾亭林诗王注献疑 汪宗衍 (106)
《开元天宝遗事》标点商榷 缪元朗 (110)
《太平广记选》注释商评 刘凯鸣 (113)
《儿女英雄传》标点辨误 隋文昭 (123)
校注本《儿女英雄传》注释商略 隋文昭 (137)
《元散曲选注》注释商榷 刘凯鸣 (155)
《清忠谱》整理本校点的失误 徐沁君 (166)
《徐霞客游记·浙江日记》一处勘误 徐建春 (170)
《蜀中名胜记》点校质疑 许世荣 (171)
《历代诗话续编》点校拾遗 陈庆元 (180)
顾校《隋园诗话》标点质疑 王果 王镜海 (185)

-
- 新版《列朝诗集小传》文字标点疑误 武雷(197)
《史记》校勘一例 岳庆平(219)
《史记》标点商榷一则 姚之若(223)
《汉书》标点纠误 赵新德(225)
“范雎”为“范雎”之误 岳庆平(233)
两《汉书》几处地理名称标点献疑 吕名中(235)
《后汉书》标点补正 金小春(241)
《后汉书》标点商榷一例 庆平(258)
《后汉书》注释部分标点商榷 赵新德(260)
《隋书》标点一误 韦建培(274)
《宋史》正误一则 杨倩描(275)
《十国春秋》点校一误 永正(276)
《石林燕语》专名号书名号漏误十例 时胜斋(278)
读《湘山野录》札记 钟振振(281)
对于《梦溪笔谈校证》的一点补正 季羨林(285)
评《桂海虞衡志校补》 杨武泉(287)
《辽东行部志注释》匡谬 张博泉(296)
点校本《楚庭稗珠录》勘误及佚文 汪宗衍(298)
缪钞《顺天府志》影印本三误 姜纬堂(304)
整理近人著作应该认真一些
——评《谭人凤集》的编辑工作 余天得(309)
《千唐志斋藏志》“图版说明”订误 张忱石(317)
《孙子译注》商榷 刘唯力(325)
读《列子集释》札记 周克昌(347)
读《论语译注》札记 张松辉(353)
黄宗羲《留书》点校补遗勘误 洪波(366)

目 录

3

-
- 《元曲释词》商补..... 王 迈(373)
《戏曲词语汇释》误释例证..... 董树人(379)

标点注释零谈

柳曾符

(一) 早年随先祖柳诒徵先生读书，常提一些很幼稚的问题，一次问读书是为了什么，先祖简答说，读书是为明理。后来时时回味，演绎开来，觉得不但读书可以明理，反过来又感觉到不明理亦不能读书。现在姑举一例。

偶见某选本注《庄子·胠箧》“然而巨盜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句，注“揭”为“抬”。

粗看似乎不错，但再一想，抬要两个人，两个人共抬一个箱子肯定跑不快，贼为何这样大胆，而又那么笨呢？这就有点问题了。

同书下文有“故逐于大盜、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句，这一个“揭”字却又注“举”。事实上上文也当注“举”，这正是说一个小偷举着箱子在飞跑呢。

南京钟泰先生著《庄子发微》说：“揭、举也。揭、担皆于肩。然箧之为物也坚，故用揭，囊之为物也软，故用担，古人文字未有随便用者，不可不知也。”这是真读书者之言。如果释揭为抬，则不免辜负了《庄

子》的美文。

看来要讲训诂，明理二字，不能不算重要的一条。

(二) 上文谈过《庄子》的训诂，意犹未尽，谨再举一例，还是《胠箧篇》，中有“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一句。有人注“钩”字，说是“衣带钩，这里代表一般不值钱的东西”。

粗看似乎也不错，因为以“钩”和“国”对比，要点是突出其微不足道，钩当是一般不值钱的东西。

殊不知又是望文生义。因为如果再仔细一想，于理亦不可通。因为这个贼为何要拣不值钱的东西偷呢。如要是强盗发善心，那只能是笑话。

按《孟子·告子》，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以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原来钩是金制，贼当然要偷了。如此解释或较近情理。

(三) 讲语言学，强调文字、音韵、训诂。讲文字亦须明理，文字之理不外六书孰形孰声，分辨明白，大有便于识字。总之，形、音、义三者不可有矛盾。

《汉书·艺文志》有“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及瞽者为子，则苟钩鉶析乱而已”一段。“鉶”字音pī，从金，从爪。或写作从金，从辰。会意、形声皆有可说。如误写作从金，从瓜，则皆不可通，必是错字。

读书时若能如此留心，便到处皆生意味。

且有时亦不要过求僻字，如肺字何以读肺，一注意